

**父权制
与
资本主义**

[日]上野千鹤子

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在东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数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野千鹤子开始思考性别不平等问题，作为女性主义的启蒙者和思想者，她的人生伴随了战后日本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历程。

她的研究涉及性别理论、民族主义、家庭、养老与死亡等。

出版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一个人的老后》《厌女》《女人的快乐》《看护社会学》等著作。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出版于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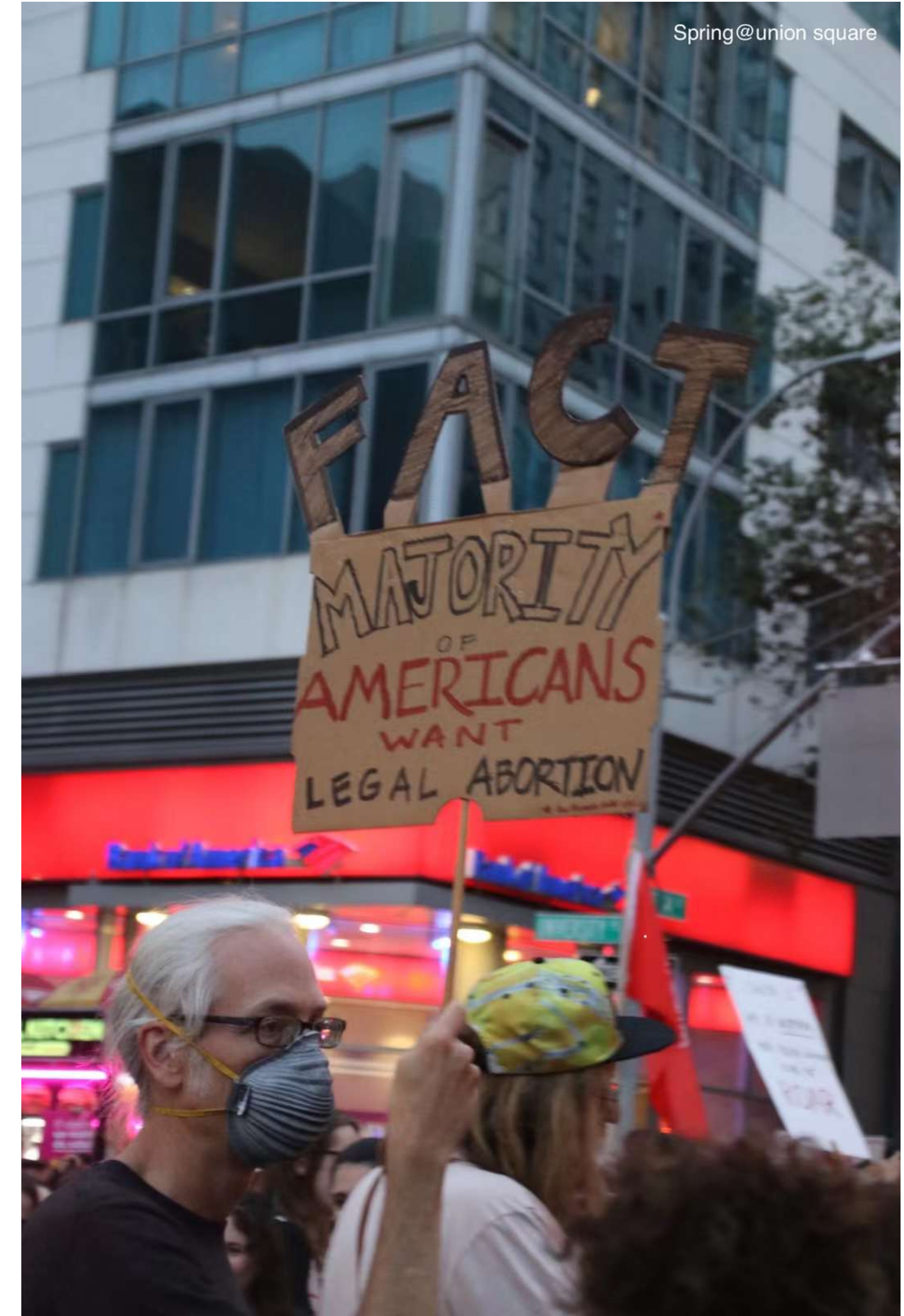
作为妇女运动家、两性平等理想的践行者，上野千鹤子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

她对女性被压迫的命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亮出了绝不宽容与毫不妥协的态度。

正如《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上野指出：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女性被“承诺”给予“自由”“平等”，但最终却“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

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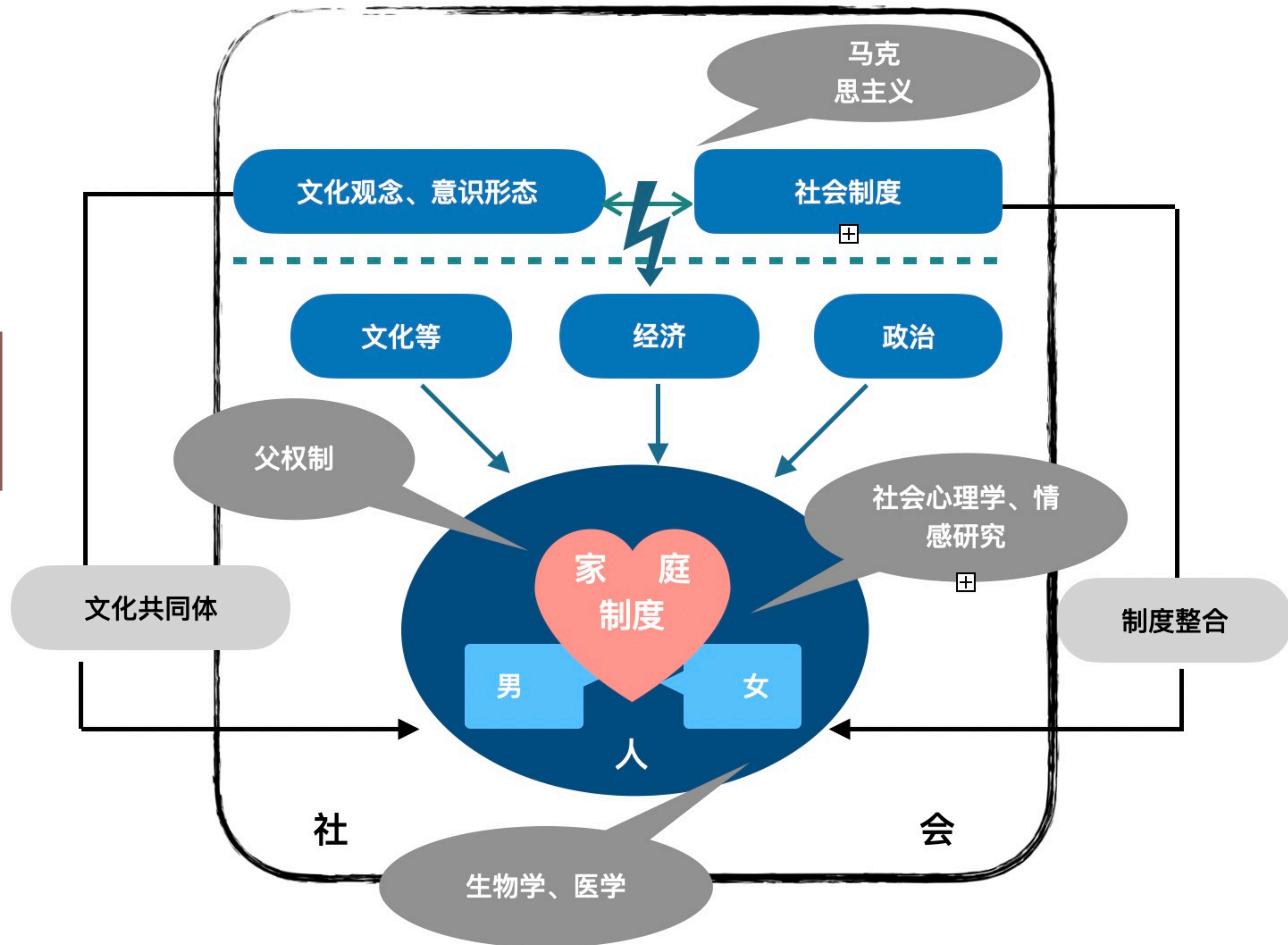
- 1、我关于女权的认知来源（承认差别与人权为基础）
- 2、有关人类繁衍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论辩（人类未来及国家命运）
- 3、人权、生育权和优生论的矛盾（美国宪法堕胎权的修订）
- 4、社会学维度的性别思考，性别问题的地方差异（两个例子）



中文版序言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地区与马克思主义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区，这两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属于体制内，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反体制的。对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不是“由于苏联的存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是“无论苏联存在与否”，都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群人。而当下，中国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亦是如此。在这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下，拙著也许会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其中之一，然而作为本书作者我对此不由得感到为难。

我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并非完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论述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不可或缺的。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产、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劳动，是因为这种行



新·全球文明史译丛
主编 王秋生 肖冰

父 权 制 与

一枚射向一切
压迫女性的体制的子弹

资 本 主 义

[日]上野千鹤子 著
邹韵 薛梅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揭露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合谋
击碎家庭的“爱的共同体”神话

“爱”，其实是在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是女性为了克服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甚至连“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都是非自由的，无法逃离父权制的陷阱。浪漫爱情也许可以将女儿从“父亲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却会使她落入“丈夫的权力”的统治。

东京大学硬核教授
女权声明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是合理的吗？
全职妈妈是一个好选择吗？

家庭和职场，女性的最佳选择
究竟为何？

在日本女性告别“专职主妇”时，
中国女性为什么想成为“专职主妇”？

探讨的主要问题

该书是一部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立场阐述两性性别差异根源的重要理论著作。

本书分析了压在当代女性身上的两座大山，即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种双重的控制，使女性到今天依然在屈从的地位中。

女性进入社会参与生产劳动，反而加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这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角下得到的观点。

关键概念： 家务劳动、再生产、父权制

1、上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受到启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她提出“无酬家务劳动”的概念，指出：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2、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女性因为性别关系，在家庭之中所从事家务劳动、生育、养育、养老护理等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或不可缺的，而再生产劳动是“无偿的”。

“再生产”（reproduction）的概念与父权制的概念相同，是极富争议的多义概念。再生产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

- （1）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
- （2）劳动力的再生产；
- （3）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

[Walby, 1986; Barrett, 1980; Edholm et al., 1977]

“家务劳动”的发现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r）。“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missing-link）。近代工业社会分离了“市场”和“家庭”，在这样的历史固有空间中，将这种分离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一环就是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近代才诞生的概念，它不是超越历史的概念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家务劳动历史性的提问，成功地明确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固有的压迫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并没有包括人类全部的劳动。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试图将市场社会相对化。他认为，虽然市场和市场中的财富即商品的出现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当“土地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近代固有的资本主义市场才得以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劳动力都能转化为“劳动力商品”。市场将某些劳动“商品化”的同时，并没有将另一些劳动“商品化”。而家务劳动就是非“商品化”的劳动之一。

没有被市场化的劳动只能停留在“私人劳动”这个层面。塞科姆

¹ “何为家庭主妇”这一问题与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紧密相关。” [欧克利（Oakley），1974：日译本16页]

以爱之名的劳动

“家务劳动”这一概念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家务劳动”这个概念的形成让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亦是劳动”。理论层面上对“概念”的新发现带来了认识上的变革。随着人们认知“地图”的改变，世界也焕然一新。这就是理论的力量。在“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形成

030

并广泛传播之前，“家务”并没有被视为“劳动”。被“家务和育儿”缠身的专职家庭主妇们，尽管“每天都很繁忙辛苦”，但依然被讥讽为“包三餐还可以午睡的人”。若她们争辩道：“我也是起早贪黑像蜜蜂一样勤勤恳恳地在工作啊”，对方只一句“你干的活根本不算工作”就轻易将她们驳倒了。倘若被说“家务不是工作”，女人们就只能怯声说道：“哦，是么……”

但是，“家务劳动”这个概念的出现给予了女性们以理论的武器。7

家务劳动与家庭主妇的勾连

但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阶级因素逐渐被消解，家务劳动逐渐由家务佣人变成了由家庭主妇来做。从历史顺序来讲，与其说从事家务劳动的是家庭主妇，倒不如应该说家庭主妇之后才开始从事家务劳动。

从事家务劳动的是家庭主妇。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家庭主妇所从事的劳动是家务劳动。这样的定义有着历史性的新意。将“家庭主妇劳动”与“家务劳动”同义化，就要让家庭主妇的地位失去特权性并将其大众化。

家务劳动论争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家务劳动”本身。这一概念阐释了：（1）家务劳动是劳动；（2）通过不正当剥削的劳动这一问题明确了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正如道菲指出的，“女性运动迫在眉睫，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来看，家务劳动是劳动，而且是被剥削的劳动”。[Delphy, 1980: 99]

“承担非雇佣关系的家务劳动的女性”被称为“家庭主妇”。虽说如此，“家庭主妇”的所有劳动并不能被等同于“家务劳动”。梅棹忠夫在第一次家庭主妇论战中尖锐地指出：“在‘家庭主妇’所进行的劳动中，包含了像编织、烤面包等出于兴趣的充数劳动。”用梅棹的话来说，便是“伪劳动”[梅棹，1959]。除此之外，像清理壁龛装饰柱¹、玄关处摆弄插花等行为只是伴随着“家庭主妇”这一身份的形成而产生的劳动罢了。在“家庭主妇”这个身份得以大众化之前，人们无论是打扫、洗衣、做饭还是在其他家务活动中都未曾享受过如此高的生活品质。但是，自“家庭主妇”及与之相伴的高质量的“家务劳动”的出现，为了维持其生活质量，“家庭主妇”更成了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将“家务劳动”定义为“家庭主妇所进行的劳动”是比较新鲜的。实际上，在“家庭主妇”这一身份形成之前，“家务劳动”就已经存在了，且“家庭主妇”相对于“家务劳动”这一概念而言，是独立的存在，仅表示“户主之妻”这一身份地位。像是德语的Hausfrau、英语的housewife等原本都是表示“家中女主人”的词语。日语中“主妇”一词的通俗说法“家刀自”、“家主”等词语都含有“一家之女主人”的含义。作为“一家之女主人”的“家庭主妇”们所进行的劳动，本来就不算是“家务劳动”，而是负责指挥督导的“治家”劳动。实际上，“家务劳动”（甚至是育儿）本是保姆、佣人、奶妈的劳动，而非“家庭主妇”必须亲力亲为的劳动。

对此，在激进女权主义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欲将作为父权制物质基础的性统治的结构定型化。

关于父权制的定义，哈特曼给出了以下解释。

我们将父权制定义为：拥有物质基础且存在于男性间的阶级制度关系以及最终使男性统治女性成为可能的、只存在于男性间的一系列社会关系。[Hartman, 1981: 日译本65页]

索科勒夫也将父权制定义为“使男性统治女性成为可能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总和”[Sokoloff, 1980: 154]。濑地山在上述论文中，整理了有关父权制的各种定义，并最终给出了以下定义。

(父权制是指)基于性的，权力由男性主宰且分工被固定分配的一种关系和规范的总和。[濑地山, 1990a: 80] (括号处为译者所加)

但是，这仍有不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概念的核心是性统治中存在“物质基础”(material basis)。这才是超越激进女权主义提出的心理主义—意识形态(Ideology)式的父权制观点，也是之所以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唯物论式分析的理由。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Hartman, 1981: 日译本65-66页]

父权制

物质基础

道菲称家务劳动为劳动，且是“生产性”的劳动。然而这里的“家务劳动”是指在家庭内部由名为“家庭主妇”的已婚女性所承担的无偿劳动。我们把这种生产的方式称为“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而形成“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统治结构便是“父权制”。

父权制是指，当今工业社会中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体制。而这种体制下的经济基础便是家庭内部生产方式。[Delphy, 1984: 18]

道菲谈道，“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成功地契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且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机制”。



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家庭形式，附带着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即男性投入公共领域的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劳动力，而女性逐渐被社会劳动市场排除在外，囿于家庭，成为家庭主妇。这种性别分工带来了“市场”与“家庭”的分裂，也让女性深陷从属的地位。

父权制下的性统治不仅存在于一对男女关系中，它也存在于家族集团中男性成员与女性成员之间，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作为阶层的男女关系之间。在近代家庭中，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成为对女性进行性统治的制度性基础。虽说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不进入一夫一妻制关系（通过单身或离婚等方式）就能从性统治下逃脱¹。因为作为制度的父权制能进行跨领域式的渗透，且与其他社会领域密切相关。所以即使能逃脱一夫一妻制这种直接的性统治，她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性统治。

在男性看来，女性的表面独立，往往会招来误会。女性即使不直属于男性亲属的特定组成，还是会从属于男性统治下的总体文化。

[Elson & Peason, 1981: 日译本11页]

理论视角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支配关系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妇女解放必须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但马克思主义没能触及“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经济解放固然是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经济问题解决了，妇女解放也不一定能够实现。

2

激进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认为性支配（父权制）是基本矛盾，女性一直处于男性为主的性支配之下。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女性解放的途径是挑战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3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激进女权主义那里继承了“父权制”的概念，认为父权制也是导致女性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之一。“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指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用西方女权主义性别的方法批判父权制。上野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融合或者扬弃了旧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和与其针锋相对的激进女权主义。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勾连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的统治。这一统治将女性从经济必要生产资源排除出去。因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补充的，二者并不是一方伴随着另一方，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资本主义父权制是将家庭纳入资本主义体制内，父权制资本主义指的是市场也存在父权制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来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导致了女性被压制的地位，不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女性很难获得自由。

女性—阶级？

所以说，女性的受压迫有着其物质基础。那就是，作为无偿劳动的家务劳动被一家之主的男性所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从劳动中自我异化的事实。道菲谈道，由于父权制是从其劳动的性别原理中取得利益的，所以已婚女性形成了共利害的、超越阶级差异的“女性阶级”（women class）。这种“阶级”的规定，也就是说，女性—家务劳动者有着从劳动中自我异化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否存在异化感，异化的事实是存在的。女性运动的目的便是通过对这种劳动异化的认识来组成阶级。正如道菲所言，由“女性阶级”而开展的劳动物质基础的变革才是女权主义革命的目的，而把变革贬低为不过是“意识的解放”、“文化革命”的观点全部是反动的¹。在这里，她展现了自称“唯物论者”的根据。

即使在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家务劳动也不过是父权制的“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劳动。资本主义制度尽可能地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携手共创利益。资本主义制度非但没有瓦解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反而将其改变并再重组。工业化并非将家庭置换成市场，只是改变了家庭和市场之间的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性”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性（sexuality）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性（sexuality）的占有

女权主义最初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Mackinnon, 1982: 1]

但这并不意味着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生物学主义”。这是因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就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同上]。麦金农（Catherine A. Mackinnon）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同上：2]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家务劳动论争（至少对于试图将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归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的人而言）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家务劳动这种资本主义下的非资本主义式劳动是否对资本主义有益这个问题提供了解释说明。

它提出了以下问题：

劳动力的私有再生产对资本主义是必不可缺的吗？劳动的商品化理应是经济之事，但私人劳动为什么没被商品化却被保留下来了呢？究竟是谁从女性进行的私人劳动中获利呢？ [Fox, 1986: 183-184]

在现代社会，市场从家庭中获得劳动力，而将无法成为劳动力的人返回给家庭，由女性负责照料。也就是说，女性通过在家庭的劳动，从外部维持整个市场的顺利运转。这些劳动被称为“社会再生产劳动”，即一系列与生命相关的劳动，包括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等。

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控制下，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无偿地付出社会再生产劳动，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回报。这其中起作用的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编制了一系列有关于“爱”的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是意识形态的机器：爱情的神话，让女性在前近代大家庭向近代核心家庭过渡的历史时期，自行选择和延续了父权制；家庭是“爱的共同体”的神话，让女性心甘情愿地无偿付出所谓“爱的劳动”；母性的神话，让女性极力克制自我需求，引发她们的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

资本主义虽然成功地渗透到近代社会中的众多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完全渗透到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小商品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下，如果将这些领域社会化的话，资本家将负担不起该成本。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无法承受问题如此之多的生产领域。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家务劳动就会被替换为被商品化的劳动形态（比如领工资工作的托儿所劳动者）。这会大大增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间接地提高“劳动者作为阶级的生存水平”，因此会直接导致资本利润下降这一结果。

[Blumenfeld & Mann, 1980: 301-302]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女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女性解放。 [Blumenfeld & Mann, 1986: 302]





为什么女性进入社会参与生产劳动，反而加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生产，并体会到社会劳动所带来的成果和自信。这种成果和自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一战之后，许多女性依然想要继续工作。

为了应对女性想要工作的局面，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想出了两个策略：首先，设置一些“女性专属”的职业，从而延续了对于“女性气质”的规范；更重要的是，构建出一个未婚女性雇佣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女性可以在成年后进入职场，但一旦结婚就要回归家庭，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女性“工作到结婚为止”的共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工作到结婚为止”的社会共识渐渐被突破，取而代之的是“中断—再就业”模式，也就是女性在生育和哺乳期退回家庭照顾孩子，等到孩子长大后再重返职场。选择这一模式的女性，表面上看起来是“人生赢家”，但实际上背负了三重负担：既承担着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又在育儿期间失去了原先应得的收入，还要在再就业时面临职场歧视和薪酬损失。

如何解决

女性这种“中断—再就业”模式，对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这个模式意味着它可以占有生育前女性的劳动力，还可以用低廉的薪酬雇佣“中断—再就业”的家庭主妇劳动力。对于父权制而言，丈夫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之后又能享受到妻子工作后带来的收入成果。

通过探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我和他对于女性解放的“基本问题”大体上有着共同的目标：

一、废除私有。

二、实现劳动中男女平等。

(1) 使女性进入社会劳动，与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劳动。

(2) 废除男性父权薪酬，支付给男女无差别的家庭生计费用。

(3) 实现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劳动。

三、实现母性的权利 [同上：205-206]。

在这几点之中，我并不认同第一个命题中的“女性压迫的根本问题在于私有”的观点，除此之外，我几乎全部都同意。第二个命题的三个条件，用女权主义的术语来讲便是：废除劳动市场的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男女同工同酬（包括让单身妈妈可以安心生存下去的薪酬）；男女共同参与家务。我想将第三个命题中的“母性”改成包含男女双方在内的“实现父母性的权利”。这里对“母性”这一概念的冒失使用体现了他并不理解自始至终将“母性”的政治性作为问题的女权主义。除此之外，我基本完全赞成他所提出的问题。然而他或许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未包含的问题，也正是他从女权主义之中所学到的东西。

第一部分

- 00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 001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 004 市场及其“外部”
- 007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 008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 012 批判近代的女权主义

- 013 第二章 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 013 阶级分析的外部
- 018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 021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 024 第三章 家务劳动论争
- 024 “家务劳动”的发现

- 056 第五章 再生产方式的理论
- 056 生产至上主义
- 060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 069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 073 第六章 再生产的政治
- 073 性 (sexuality) 的占有
- 077 再论父权制
- 079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 080 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
- 084 世代间的统治
- 086 女儿的价值
- 087 孩子的反叛
- 088 父权制的废除

- 091 第七章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二元论
- 091 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

002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 030 以爱之名的劳动
- 033 家庭—女权主义 (domestic feminism) 的悖论
- 037 日本的家务劳动论争
- 039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

- 045 第四章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 045 父权制的定义
- 049 家庭：性统治的场域
- 051 物质基础
- 054 女性—阶级？

- 094 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 096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 099 父权制的构成
- 103 对二元论的拥护

- 107 补论 对批判的回应



第二部分

- 134 第八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一期
- 134 工业化与家族 (Domus) 的瓦解
- 138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 140 “近代家庭”的形成
- 147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 150 “家”的发明

- 152 第九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二期
- 152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
- 155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 158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 160 经济高速增长期与第 II 期女权主义
- 164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 166 第十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三期
- 166 M字形就业形态
- 172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003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 174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 177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 179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 182 女性的双重角色
- 186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 191 80年代的改革

- 192 第十一章 家庭的革新 I
- 192 人口资源
- 196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的自由”
- 198 家庭解体——危机论
- 204 “中断—再就业”型的陷阱
- 209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 214 第十二章 家庭的革新 II
- 214 移民劳动者
- 219 “中断—再就业”型的阴谋
- 223 再生产的QC思想
- 228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 229 第十三章 尾声——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 229 国家、企业、家庭——革新的时代
- 232 批判经济学
- 235 对“劳动”概念的再探讨
- 237 “自由劳动”与“脱离劳动的自由”
- 240 “劳动”的颠倒
- 243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004

目 录

- 248 附论 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革新——90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 260 参考文献
- 278 后 记

主要观点摘录

- 1、上野在书中写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表现在女性身上，职业与家庭似乎仍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或者说在二者兼顾的过程中，女性往往身心疲惫、倍感压力。上野认为，由于日本女性无法实现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因为日本是全民中产的社会，因此，“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艰辛的”。
- 2、上野认为，“中断—再就业”型的女性与一直持续工作的女性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还与一直工作的男性之间产生巨大的收入鸿沟。打零工的专职主妇家庭与双职工家庭之间也产生了经济差距。“中断—再就业”也给女性的人生带来风险，从中产阶层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一旦离婚，女性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统计数字显示，日本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远远高出一般家庭。
- 3、“中断—再就业”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女性不得已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做出选择，也是导致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走向职场，不想因结婚和生产而辞职，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不放弃职业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中国语境的特殊性

- 1、中国地域广博，地方经济、文化、传统、民族等存在很大不同。比如，城乡差异（城市的“剩女”现象与农村的“剩男”现象）；地区差异（地区的经济差距、开放及文明程度等）；民族及文化传统差异（少数民族家庭结构、宗教信仰、生育政策等影响下的女性问题）。
- 2、中国经历过计划生育阶段，性别问题更为复杂，家庭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独生子女的男方入赘的家庭结构，走婚结构，孩子一家一个的结构等）。
- 3、女性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多，生活方式的变化及购买活动的复杂，育儿方式的复杂等，交织在一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 4、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出现、国门的开放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企业市场化的不充分、城市化的扩张、房地产的特殊性（男性独立购房越来越困难），以及，体制在中国职业结构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中国职业女性或家庭主妇与日本有所不同的方面。
- 5、中国公共舆论领域的特殊性，政治议题被压抑，在一定程度上给环境问题、医疗问题、女性议题更多的空间，尤其是互联网兴起后，女性议题的社会可见度增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女性的地位；电视家庭伦理剧在重塑女性形象上带来的影响也值得重视（比如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粗野的、霸道总裁的男性形象的衰落及贴心暖男形象的兴起等）。

90年代以后的发展

市场中出现了全球化的父权制革新。也就是说，如今，女性、老年人、移民作为边缘性劳动力从事着女性曾经在家庭中所做的工作。在家务劳动的外部化和社会福利劳动之中，这种变化开始不断蔓延。如此一来，包括性在内的年龄、阶级、种族、国别等经济外部变量就创造出了新政治差异的“边境”。女性作为国民国家这一利益共同体的一员，作为阶级集团的一员，在如今国际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她们既是受益者又是加害者。女权主义从发端之初便一直是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当下，女权主义的课题是如何对抗国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种种分裂，进而建构女权主义者的国际主义（Feminism Internationalism）。

最后仍残留的问题是，不考虑所有变量的、存在于劳动结构内部的差异性问题的。也就是为什么生育人的生命、守护死亡这种劳动（再生产劳动）是处于所有劳动之中最底层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女权主义的课题将会一直存在吧。

书中提到了全球化之后的变化，但还有个更重要的导致变化的因素是科技的发展，家用电器、互联网和智能科技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家务劳动的数量、繁复程度、耗时耗力程度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男女在家庭中的结构。



结语：

自由的人、自由的女人

人不是工具、女人亦不是工具

我们关注结构性的力量（权力）对人的制约和框限，同时不能否认爱、情感、团结在人与人交往中的作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父权制都是对立和冲突的视角，而遮盖了爱与情感在男女关系或人与人关系的作用，也是需要反思的。从结构-能动性相结合以及从冲突论转向调和论的视角去分析或许也是一种尝试。

谢 谢！